

共庆土耳其诗人希克梅特诞辰110周年

第四届亚洲诗歌节揭幕

新京报讯 (记者涂志刚 发自伊斯坦布尔)“鲜红的血,我的血, / 同黄河混在一起奔流。 / 我的心在中国, / 在那为正义的制度而战的 / 士兵的队伍中间跳动。”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院长谢冕深情朗诵着土耳其大诗人希克梅特的诗篇。当地时间6月16日,第四届亚洲诗歌节在伊斯坦布尔开幕,诗歌节期间,陈平原、臧棣、唐晓渡、骆英、郑小琼等中国批评家与诗人一行将和几十位当代土耳其诗人就“跨文化与诗歌”主题进行研讨,而诗人们的对话,就从伟大的土耳其诗人希克梅特开始。

因希克梅特相遇

“我们对当代土耳其诗歌了解还不多,但在60年

前,希克梅特的诗曾经照亮中国青年的心灵”,诗人雷抒雁举着一本60年前出版的《希克梅特诗选》,向土耳其的伟大诗歌传统致敬。希克梅特是土耳其当代新诗的奠基者,也是最早被介绍到中国的土耳其现代诗人,对中国的新诗写作曾经发生影响。雷抒雁回忆说,上世纪50年代,希克梅特和聂鲁达等诗人的选集,是青年们难得的诗歌启蒙读本,而在诗人访问中国之后,更是风行一时,他手里这本《希克梅特诗选》,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就重印三次,印数巨大。“今年是希克梅特诞辰110周年,我们要向他致敬”。

与中国诗人的集体回忆相对应,诗歌节第一天的正式研讨,就被安排在希克梅特中心举行。土耳其诗

人麦泰·厄载尔介绍说,“在希克梅特之前,诗歌必须遵循严格的韵律和音步,而希克梅特打破了所有限制,给诗歌以新的形式与活力。”尽管因为种种原因,希克梅特直到2009年才被恢复土耳其国籍,但在民间,希克梅特的诗歌一直被人们朗诵。

渴望构建互相理解的窗口

希克梅特是历史,而现实则是,中国与土耳其诗人因为缺少交流,已经变得互不了解。“亚洲诗歌节可能变成一个打通双方,沟通诗歌心灵的窗口”,在诗歌节开幕式当日,伊斯坦布尔著名的《自由报》如是展望。诗歌节上,收入10位当代中国诗人和29位土耳其当

代诗人作品的选集举行首发,这也是两国诗人第一次大规模读到对方的作品。

“这里几乎人人都写诗,虽然发表诗歌根本赚不来稿费,但是可以说诗歌仍然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谈到当代诗歌正在变得越来越边缘的世界趋势时,土耳其诗人麦苏特·谢诺尔介绍说。麦泰则表示,“土耳其现在有200多家刊物发表诗歌,有40多个诗歌奖。现在人们都谈论帕慕克,我个人也非常喜欢他的小说,但世界也同样应该看看土耳其的诗歌。”

亚洲诗歌节由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会、中国诗歌协会、中坤诗歌发展基金联合举办,每年一届,致力于促进亚洲诗歌界的理解和沟通。上一届诗歌节于2011年在韩国举行。

《脚趾上的星光》在京发布

作词人姚谦转向小说创作

新京报讯 (记者刘雅婧)2012年6月17日下午,台湾音乐创作人姚谦在北京单向街书店举行小说处女作《脚趾上的星光》新书座谈暨签售。《脚趾上的星光》今年5月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历时三年完成,是姚谦首度尝试创作剧本和长篇小说。

书中以“23+1”封电子情书的形式描述了一段发生在北京和台北的双城之恋,转战小说创作领域,姚谦以细腻的情感描写延续了其一贯的歌词创作风格。对小说、剧本、歌词创作三种完全不同的体验,姚谦表示:“很有趣,开拓了不同的经验和心情。”

粉丝欢庆“布鲁姆日”

作品版权到期引发“乔伊斯热”

6月16日是一年一度“布鲁姆日”(Bloomsday)——为纪念20世纪爱尔兰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巨著《尤利西斯》而产生,6月16日是《尤利西斯》的主人公利奥波德·布鲁姆在爱尔兰街头游荡的日子。每年的这一天,世界上60多个国家的乔伊斯爱好者都会聚在一起,举行各种各样庆祝活动。

乔伊斯卒于1941年,其所有作品于去年年底过了70年版权保护期,进入公版领域。对于全世界的乔伊斯爱好者来说,这意味着他们从此可以在公共场所朗读、表演乔伊斯作品及改编著作,而不用担心来自乔伊斯基基金会的压力。因此,今年的庆祝活动尤其丰富,包括《为芬妮根守灵》的音乐剧

版本发布,以及爱尔兰图书馆发布的部分乔伊斯手稿等。乔伊斯的孙子斯蒂芬·乔伊斯一直以来严格地管理着祖父的基金会,在2004年的布鲁姆日,他甚至为公众公开朗读乔伊斯作品而威胁要将爱尔兰政府公告上法庭。

“乔伊斯作品版权到期是相当具有解放感的,对我们来说可算是一个解脱”,位于都柏林的詹姆斯·乔伊斯中心经理马克·特雷纳说。乔伊斯中心致力于推广乔伊斯作品阅读及相艺术活动,今年还专门请来一位作曲家创作《为芬妮根守灵》的音乐剧。特雷纳说,“人们现在可以回去自己赞颂乔伊斯的世界而不用担心受到律师的打扰。”

编译:吴永熹

郭雪波称生态危机实质是文化危机

新书《青旗·嘎达梅林》发布

新京报讯 (记者刘雅婧)一百年来,把草地变为耕地是否符合自然生态规律?我们所看到的历史是否就是曾存在的真相?农耕文明是否误解了游牧文明?

在6月17日由中国作协创研会主办的郭雪波《青旗·嘎达梅林》研讨会上,与会者围绕上述问题,从蒙古民族英雄嘎达梅林的拨乱反正说起——“嘎达梅林造反,反对把放牧的草地开垦成农耕的田地,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碰撞和两种文化的冲突。”之后溯及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间的冲突和

误读,最终上升到二者当前共同面临的生态困境。

为了给嘎达梅林正名,郭雪波采访了几十位健在的当事人和知情者,查阅了几百万字资料,留下三十多万字的采访笔记。耗时四十年,留下了70万字的长篇,力求接近历史真实。

这部非虚构作品具有鲜明的环保意识,对人类生存状态进行了深度批判和反思——当人类中心主义泛滥,地球生态遭遇空前破坏,究其原因,是人类文化信仰出现了问题,生态危机实质上是文化危机。



刘瑜(左)、郭凯(右)在单向街图书馆与读者讨论分享《王二的经济学故事》。

刘瑜称欧债与民主无必然联系

《王二的经济学故事》首发,刘瑜、郭凯驳民主导致欧债危机

新京报讯 (记者张弘)纷拥而至的读者将单向街图书馆二层挤得像一号线地铁。16日下午,《王二的经济学故事》新书分享会举行,学者刘瑜、郭凯均认为,欧债危机和民主无关。

《王二的经济学故事》的作者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郭凯。郭凯曾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学家,现在在中国人民银行供职。该书创造了一个主人公王二,用生动有趣的故事来说明经济

学的本质。在当天的对话中,刘瑜称,前段时间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到中国来,自己也问起过他怎么看欧洲债务危机。刘瑜说:“现在很流行一种说法,希腊、西班牙出现了债务危机,是因为他们福利开支过大,福利开支过大,是因为他们有民主制度,也就是说民主造成了这种债务危机,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他个人在西方也是比较偏左的,他说我完全不同

意这个看法,如果民主制度会导致高福利,高福利就会导致债务危机的话,那你们怎么看北欧?北欧的福利实际上是最高的,而且他们是非常民主的,但是这次债务危机没有席卷到北欧,所以这里面没有必然的关系。这次希腊等国的债务危机,很可能是具体的经济政策和具体的政策执行、或者是一些技术性的操作导致的问题。”刘瑜说,“我个人觉得他至少是在这一点上说服了我,民

主不一定会导致不可理喻的高福利,由此导致必然的债务危机。所以我觉得这里面不存在单线的因果关系。”

郭凯也认为,“民主和债务危机没有必然联系,整个欧元区都是民主国家,有些国家就挺好的,比如德国人就做了好多改革,将工作时间改长了,将养老金减少了。在所有民主国家中,出现债务危机的就是那几个国家,民主国家和债务危机没有必然的联系。”